清代俄国来华留学生问题初探

米镇波　苏全有

清代来华俄国留学生问题是中俄关系史特别是文化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由于种种原因，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非常薄弱，甚至于可以说几乎还没有展开研究。国内许多有关留学生运动史的著作，内容仅限于我国学生出国留学的事，而关于外国人来华学习的历史却没有专门的研究。本文的宗旨是，就1840年以前，清代俄国来华留学生问题作一初步研究。探讨的内容涉及俄国留学生来华学习的历史背景；他们来华所走的路线；来华学生人数的统计，总名单一览；他们在华学习和生活的概况以及他们在中俄关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囿于学短识浅，难免挂一漏万，尚祈同仁不吝指教。

一、俄国留学生来华的历史背景

明清之际，出现了中外文化的大交流。欧洲许多国家，当然，包括俄国在内都对当时的中华帝国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对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中医中药和中国建筑等方面。因此，许多天主教传教士特别注意对中国的城市、商业、手工业进行研究，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进行研究，积极认真地学习满汉文字。当时，中国的两部书最引人注目。一本是《天工开物》；另一本是《景德镇陶录》。西方人想通过这些文献来直接获取中国人烧瓷器的秘诀。因此，他们想翻译这两部书，但终因中文水平不够而不得不中途辍手。①1712年有一个传教士成功地潜入中国瓷都景德镇，了解到了中国人制瓷的方法。他写了封信寄回欧洲，而这封信被译成了各种文字在欧洲广为流传。②当时流传着的还有一本书是介绍荷兰彼德·王·戈尔诺外交使出使中国情况的。这样一个中西文化大交流的背景，刺激了沙俄的最高统治者。1703年8月，彼德大帝创办的第一张报纸《新闻》报刊登消息，说，有一大批中国货运抵俄罗斯。该消息及时披露，彼德大帝想建成一座城市，为的是吸引更多的中国货更方便地运抵俄国，表现了对中国商品的极大兴趣。这个城市就是后来的彼德堡。③在彼德堡的奥拉尼思巴乌姆和皇村都曾按照中国风格修建了园林与建筑，在一系列宫殿中盖了中国式样的房间。④当时，沙俄上层贵族对中国物品的追求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当然，沙俄政府对中国的兴趣决不只是限于此，出于内政和外交的需要从1618年到1678年的60年内，它连续三次派出外交使团前往中国，其中最大的一个代表团有150人。18世纪初，那些到过中国的俄国商人散布说：康熙皇帝对天主教有好感。于是，俄国开始向中国派出了第一个东正教使团，以期能够在华开办东正教堂。⑥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初，在整整近一个世纪的外交努力中，俄方派出的外交使团均在语言交际方面遇到了大量麻烦。限于双方交往时间不长，因而，当时缺乏互相沟通的必要的语言条件。比如，1619年俄使宜完匹特灵将一封汉语信件带回莫斯科，但当时莫斯科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它.1658年出使清国的伯夫列夫与阿勃灵使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1728年6月，《中俄恰克图条约》互换文本时，经核校发现，俄文泽本把“鄂博”一词译成“石头标记”，

就此清方指出，此“系翻译人员之误”。⑥有鉴于此，中俄双方曾就互相往来使用何种语言作为工作语言的问题，进行过认真的交涉。1675 年，尼古拉·斯帕法里使华时，曾就中俄官方通信和进行外交商谈时应采用哪种语言一事同清朝官员商议。他建议，最好使用拉丁文和蒙古文，以便双方都能正确理解互相交往中所谈的全部内容. 1686 年，清政府也曾向使华的俄国专使维纽科夫和法沃罗夫建议，往后两国信函往来，可以用三种语言，即俄、拉丁、蒙文。最后，中俄双方商定，以拉丁文作为两国交往的中介语言。为什么选定拉丁文，法国学者葛斯顿·加恩有一段客观评价：“中国人是很熟悉蒙文的，而俄国人由于与外贝加尔区的布利亚特蒙古人接触的缘故，也很通晓蒙文，因此，蒙文本来是很合用的，”但是后来，由于“在尼布楚谈判时，用蒙文或满文作通用语文的提议已经遭到了拒绝，而与北京在外交往来上用俄文又是不可能的，于是拉丁文便成为两国交往通信的唯一语文了”。⑦既然如此，在清朝，耶稣会士的地位一度显得很重要。比如法国人巴多明“圣祖仁皇帝时二十余年，恒待皇上左右”，“惟于满汉言语则习之甚熟。适中国与俄人互订和约往来照会，俱用拉丁文字，故皇上于京邸特设一馆，令满洲年幼子弟，学习其文，即派巴多明为教习”。“盖中俄互市以来拉丁文字为两国交涉事件必用之文字，故教习拉丁文乃当时之要缺”。⑧巴多明死后，耶稣会士宋君莱接替主司其事。宋君莱原各安托万·戈比(Antoine Ganbil)法国人，在中国度过了大半生，通晓汉文，满文，中俄往来谈判时，充任清政府正式翻译。这些耶稣会士按照理藩院的意图，用拉丁文起草各种官方文书，并将俄方的来文泽成汉文，满文，以便呈览。显然，在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耶稣会士在中俄交往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状况渐渐为俄国所不满。因为俄国迫切需要中国的情报，而在语言障碍的制约下，他们的情报只能由耶稣会教士供给。俄国政府所希望的是直接接触中国人本身，或者通过中国的出版物来获得它在外交和政治上所需要的资料。因此，俄国对于获得情报的过程是缓慢而间接的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这种情况往往使俄国对华外交处于一筹莫展的境地”。这一切都促使俄国非要设法越过耶稣会教士居间调停不可的阶段”，以俄国员来代替法国和葡萄牙的耶稣会教士”成了最迫切的需要”。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国派留学生来华学习语言的要求应运而生了。从清政府方面来讲，到康熙晚年已对耶稣会士不顾中国民情强行禁止基督徒祭祖，崇拜孔孟之道的行为严重不满。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明令禁止天主教。五十九年，又奉上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⑩这样，耶稣会士的地位一降而再降。到雍正初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被赶出了中国，耶稣会士在华地位已彻底动摇了。这样，为了自身利益和中俄交往计，清政府方面对俄方提出的留学要求，则需认真加以考虑了。1728 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署。双方议定，俄方每一届新教会可带 5－6 名学生来华学习满汉藏文。

二、俄国留学生来华的路线及其人名单总览

谈到俄国留学生来华的路线问题，我们不能不多说几句。1675 年斯帕法里使团访问北京。该使团返回俄国之后，斯帕法里写了一部书《中华帝国志》，对他此次出使中国的所见所闻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其中，第五章谈到了前往中国的路线问题，对这方面的情况作了历史性的总结。他提出了从陆路到中国去的 7 条路线⑪。实际上，从西伯利亚到中国，不外乎经两个方向前往：一条是到达贝加尔湖折向南到色楞格斯克；另一条是继续向东到达尼布楚之后，再到达海拉尔，进入脑温镇，斯帕法里克走的是第二条路线。1728 年，《中俄恰克图条

约》签订之后，俄方商队和留学生来华的路线作了调整，大致如下：圣·彼德堡—雅罗斯拉夫尔—大乌斯秋格—索利维切戈茨克—凯村—索利卡姆斯克—上图里耶—图林斯克堡—秋明—托博尔斯克—经过鄂毕河和叶尼塞河两大水系之间的水陆交通网辗转周折来到额尔口城即今天的伊尔库茨克市—再越过贝加尔湖来到色楞格河口，溯流而上到达恰克图，即将进入中国版图了。俄国方面的留学生到达额尔口城后，由西伯利亚衙门长官固毕尔那托尔(即省长)知照中国驻库伦办事大臣，详细地说明入境人员的姓名情况，护道官员的级别，准备何时进京等情况。然后，库伦大臣再禀报理藩院，根据指示，再派出官员到边境迎接俄国留学生。进境的俄国留学生再经过买卖城(即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国色楞格省阿尔丹·布拉克市)—库伦(即乌兰巴托)—伊罗河，⑫一步一步地向北京前进。一般情况下，从圣·彼德堡到北京需要走整整一年的时间。其路途上的艰辛，自然可以想见。

现在我们把自从《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以来到 1840 年，这近 120 年间俄方派出的来华学习语言的学生名单及来华时间开列如下：

1727 年

卢卡·沃耶伊科夫　伊万·普霍尔特　费奥多尔·特列季亚科夫

1729 年

格拉西莫·舒利金　米哈伊尔·波诺马廖夫　伊拉里昂·罗索欣

1732 年

格拉西姆·巴里什尼科夫　伊万·贝科夫　阿列克谢·弗拉迪金

1736 年

伊万·希罗夫

1743 年

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　安德列·卡尼亚耶夫　尼基塔·切卡诺夫

1746 年

叶菲姆·萨赫诺夫斯基

1757 年

丸维拉·叶尔莫拉耶夫　斯捷潘·索科洛夫　斯捷潘·亚基莫夫　伊万·奥泽罗夫

1769 年

雅科夫·科尔金　阿列克谢·帕雷络夫　费奥多尔·巴克舍耶夫　阿列克谢·阿加福诺夫

1781 年

叶戈尔·萨列尔托夫斯基　伊万·菲洛诺夫　安东·弗拉迪金　阿列克谢·波波夫

1794 年

帕维尔·卡缅斯基　瓦西里·诺沃肖洛夫　斯捷潘·利波夫佐夫　伊万·马雷舍夫　卡尔普·克鲁格洛波列夫

1808 年

马尔克尔·拉克罗夫斯基　列夫·齐马伊洛夫米哈伊尔·西帕科夫　叶夫格拉弗·格罗莫夫

1821 年

康特拉特·克雷姆斯基　扎哈尔·列昂季耶夫斯基　瓦西里·阿勃拉莫维奇

1840 年

约瑟夫·戈什克维奇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戈尔斯基　伊万·伊里奇·扎哈罗夫⑬

根据以上资料可知，从《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到1840年，在这近120年的岁月中，来华的学生共41人。由于疾病，酗酒、打架等原因死了十几个人。他们的尸骨有的留在了北京，有的则埋在了戈壁沙漠中。⑭他们的年龄均未过40岁。

三、关于俄国来华留学生的概况

关于这个问题系统的记载几乎没有。现仅就所见列的中外资料，经过分析对比，分析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1. 人员的选派和学习期限

第一批来华的留学生是从伊尔库茨克耶稣升天修道院院长普拉特科夫斯基在该城创办的一所蒙文学校中选拔的。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留学生都是从下层神职人员，类似于学徒那样的阶层中选拔。因此，个人素质不高。后来，逐渐改为从神学院的大学生中选拔。到19世纪初，随着对教会首领配备的严格，在留学生挑选方面也更加严格，因而素质有所提高。参与留学生挑选工作的政府和宗教部门有：枢密院，萨那特衙门，最高宗务会议，外务部亚洲司。

关于学生们在华学习的期限，前后也有变化。1755年2月6日俄外务委员会发出指示：对派赴北京学习语言的学生，自他们到达北京之日算起，学习期限为12年，期满后即行返回俄国。⑮这个期限确实是太长了，它导致了俄国留学生的强烈不满。1840年以后，经萨纳特衙门批准，第十二届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通知理藩院，留学生在华学习的期限已改为五年轮换一次，理由是“喇嘛学生等俱有父母在家思念情切”。⑯

2. 来华留学生的心理状态浅析

俄国留学生来华，这在其个人一生的经历中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因而，他们的心理状态是不很正常的。

在1800年以前，那些来到中国的留学生都“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到一个根本不了解的国家去是被迫的，是为了个人生活而冒风险的”。他们视中国为“天之涯，海之角”，象躲避”埃及之枷”似的，不肯到中国去。即使到了中国，也不肯在那里呆下去，而总是盼望新的学生们来替换他们。因此，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认真学习满汉文字。⑰“那一时期不是因为贫困而是出于自愿到中国去的人是太少了。甚至于因为到中国去而使他们感到极度的失望”。“不自由的教会生活对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来说，无异于被判了刑”。⑱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俄国来华留学生对一切都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且由于长期住在那里，他们就会感到非常寂寞无聊，因而纵饮无度，断送自己的天赋，甚至往往葬送自己的生命”。⑲显然，这些学生们由于被迫、远离祖国、在华留学年限太长等原因，导致他们严重的心理扭曲，因而在行动上多怪异和失常。

19世纪，俄国方面在挑选留学生的条件上，开始更加严格起来。尽管来华学习的留学生都出于自愿，但他们在离开自己的祖国和亲人的时候，要在一个远离故土的国度里度过10年人生的时候，他们的心理仍然是十分矛盾和痛苦的。“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和祖国和亲人告别，走上前往陌生国家的路程时，往往是哀泪洗面”。⑲他们与自己的俄罗斯同胞紧紧拥抱，久久不肯分开，亲人们送他们一程又一程。当他们走进蒙古以后，开始过起了游牧生活”。那

里，除了太阳，什么也没有。看不见在我们的祖国所能见到的树木和草地。我每向蒙古迈出一步，就仿佛是在向坟暮迈进。所不同的是，在坟暮里什么感觉也没有，而现在我还有感觉……”⑳由此可见，一个欧洲人，处在另一个文化圈中的欧洲人，在他进入东方，进入与欧洲完全不同的文化圈中以后，由于东西文化冲突，因而在他们心中笼罩上一层阴影。加上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变化，更使他们感到难过和痛苦”。在蒙古9月份当地已零下11度，躺在阴冷潮湿的地面上，盖两个皮袄仍冻得发抖。在伊罗河岸边上开始吃面包干，从9月20日起，我们就开始喝泔水似的井水，从此就没再见过河流和树林”。㉑综上所述，无论是1800年以前，还是1800年以后来华的留学生，由于环境和文化氛围的根本改变，导致来华俄留学生的心理状态不好，大部分人出现了心理反常。因而关于了们打架，酗酒，打撞上司的报告屡见不鲜，应该说，心理失衡是导致他们出现以上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3. 来华俄罗斯留学生学习情况

由于俄罗斯留学生来华学习是中俄双方政府通过条约的形式议定的，自然，清政府方面就要负担对这些留学生的教学工作。雍正六年，经理藩院议准，俄罗斯国学生俟送到时，令其在俄罗斯馆居住，交与国子监选满汉助教各一人住馆教习清汉文。㉒乾隆十五年奏准，以六堂内助教兼管俄罗斯学务。㉓纵观有清一代派教师到俄罗斯馆教授清汉文的制度基本上是坚持下来了。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两国外交关系状况的影响，这一制度执行起来也是好好坏坏，情况前后不一的。这种情况在俄罗斯留学生当中有反映。“况且那些官方派来的教师，由于没有任何奖赏，常常表现得很懒惰并且不诚实”。㉔由于在当时的北京城里又找不到适合留学生们使用的教材，自1796年始，北京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始用教会的钱来雇佣私人教师，教授满文、汉文。㉕被雇佣来的教师由于不能长期担任这一工作，经常换来换去象走马灯一样，引起了俄国留学生们的不满：“安秀才五月初来的，到了月中他就辞职不干了。王秀才五月中来的，由于酗酒八月底就被辞退了。卓尔特赫喇嘛，藏语教师，年初来的，年底就扔下我们走了，如同把虾搁到了浅滩上一样”。㉖如此看来，俄国留学生们要想有所进步，便只有靠自学了。自学对于那些从来也没接触过汉语和满语的人来说谈何容易”。几乎所有学习汉语和满语的学生都自制一部或者从自己的俄罗斯前辈及西方传教士手中转抄一部手抄本的俄汉、俄满文字典、”以便自学时用。所有来华学习的俄国留学生都先要用两三年的时间来背熟，记牢汉字词汇；然后再在汉语文言当中爬梳五、六年，只有到了第十个年头才有可能着手从中文向俄文翻译。㉗由此可见，学习生活是漫长和枯燥的，有的学生便是死于这种马拉松式的学习当中”。弗·瓦·戈尔斯基他完全是由于孜孜不倦的学习而死的。他甚至在吐血后仍然通宵达旦地学习。他不仅学习汉语和满语，修士大司祭还要他学习藏语和蒙语，这就毁坏了他那钢铁般的身体”。㉗综上所述，应该承认，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40年代所有来华的俄国留学生在学习中遇到了空前的困难，他们知难而进，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他们所做的事业是开拓性的。

4. 来华俄罗斯留学生的生活情况

根据《中俄恰克图条约》清政府承担了来华留学的俄国留学生的生活费用。雍正五年议准，使臣萨瓦，及留京学书之鄂罗斯四人，教习二人，亦令在馆居住，一例给予口粮食物。㉘乾隆六年，旨简化满汉各一人令其兼营教习学生衣服饮食等项由理藩院给发。㉙这项制度基本上延续下来了。当然，情况总是有好有坏，前后有差异的。当时北京的俄罗斯馆里，构建了宿舍不少的住房，有客厅、商队的宿舍，学生宿舍在最后一排。从居住条件来讲，俄罗斯留学生不

是很习惯的："房间又矮又挤，对于和教师一起学功课很不方便。冬天对身体来说危害很大，你不得靠近任何一面墙，否则潮湿和寒冷就会侵透你的全身，于是，在这里常见的风湿病则不可避免了"。㉚由于沙皇政府很少拨款来用于改善学生住房，历届教会首脑 又不关心这个问题，导致房屋年久失修，"一遇雨天，宿舍漏水，学生们就无处可以容身"。㉛鉴于这种状况，清政府常常拨给这些留学生一些银两，提供给他们一些生活用品，把不服水土的学生送回，尽量做一些改善学生生活状况的事。㉜留学生们远离祖国思念亲友，为此，中俄双方政府为他们与国内通信联系方面尽力安排得更好一些。每年的 2 月、5 月、8 月、11 月，不晚于每月 20 号，圣·彼德堡和北京之间同时向对方城市派出信使；每年的 1 月、4 月、7 月、10 月，北京和伊尔本茨克、北京和恰克图之间也是同时向对方派出信使。这样，在一年当中几乎每个月都有信件往来，这对于安定学生们的人心起了积极作用。㉝当然，这些信使决不仅是为送送私人信件而设的，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带着许多官方文书。

四、俄国留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及在中俄交往中所起的作用

1. 进入外交界负责对中国或亚洲国家的外交

从俄国来华学习毕业后的学生中，曾选拔出相当一批人进入外交界，象俄国外交部亚洲司，恰克图海关，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衙门，负责衬华交涉，翻译各种文件，从而使其对华外交更加主动起来。比如，1840 年随第十二省传道团来华学习的伊·扎哈罗夫，《清史稿》上称之为杂哈劳，毕业后，于 1851 年随同俄方全权特使耶·彼·科瓦列夫斯基在伊犁与清政府代表伊犁将军奕山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后来一直在伊犁，并在塔尔巴哈台同清政府代表签订了关于焚烧塔尔巴哈台贸易圈的赔偿条约。此后，便擢升为伊犁总领事。㉞1864 年协同巴布科夫一起在塔尔巴哈台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掠去我国西部领土多达 40 余万平方公里！㉟此外，当上外交官的还有帕·卡缅斯基，米·西帕科夫，科·克雷姆斯基等人。克雷姆斯基是 1821 年到京，1931 年回国的。先后担任七级翻译，九等文官。在英法联军侵华和签订《北京条约》期间任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翻译。西帕科夫是 1807 年来京，1821 年回国的。在外交部亚洲司供职，任七等文官。帕·卡缅斯基是 1794 年来华，1807 年学成回国，任外交部亚洲司八等文官。1820 年受命出任第十届传教士团领班，受到沙皇接见。㊱卡缅斯基来华之后全力贯彻亚历山大一世意图，大力收集中国的图书资料。经他的手，于 1830 年往俄国国内运回一大批汉文和满文书籍。这批书分别送给了伊尔库茨克宗教职业学校，彼德堡图书馆，彼德堡宗教学院、莫斯科大学，外交部亚洲司。㊲约·文什克维奇是 1840 年来京，1848 年回国的，后来担任了普提亚达驻日使团的译员，亚洲司的官员，俄国第一任驻日本函馆的领事。㊳

2. 大量翻译汉满语文献，编制字典

来华俄国留学生毕业之后，利用他们所学到的汉译本领，凭着他们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方面的知识，开始从事汉学研究，为俄罗斯的汉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伊·罗索欣 1729 年来京，1741 年回国。翻译和注解的中国书籍近 30 部。其中包括《1730 年京报摘抄》（叙述了该年 9 月 19 日大地震死亡七万人的消息）、《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八旗通志》等。他的学生雅·沃尔科夫为第一个翻译《四书》的俄国人。阿·列昂季耶夫 1743 年到京，1755 年回国。从 1771 年至 1786 年翻译出版了大量满汉文书籍，如《大清会典》、《名臣奏议》、《图理琛异

域记》、《大学》(第一本俄译本)、《中庸》(第一本俄译本)。“十八世纪俄国共出版有关中国的论著 120 种，他的译著即占五分之一，许多是欧洲第一次泽本，并有大量注释”。㊴扎·列昂季耶夫斯基 1821 年到京，1831 年回国。他在北京时，因首次向中国介绍俄国史而获清廷“国师”之称。回国后，最早尝试翻译满文诗和汉文小说，并编纂了大量的汉满俄文字典。计有：《康熙字典》、《汉字两译》、《汉字西译补》、《清文简要大全》、《满语辞典》、《汉语辞典》等。瓦·瓦西里耶夫，1840 年来北京，1850 年回国，是俄国中国学学派集大成者。1886 年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他翻译了有关中国佛教的大量文献，关于史地、文学的文献，编纂了满俄大辞典。

3. 回国后开展满汉语的教学工作

瓦·瓦西里耶夫 1855 年任彼德堡大学东方学系教授，汉语教研室主任，教满语和中国史地与文学。罗索欣和弗拉迪金曾分别主持一个学校的满汉语教学工作，列昂季耶夫也教过汉语。克雷姆斯基回国后任新设立的恰克图汉语译员学校教员，任教约 30 年。这些人为俄罗斯的汉语教学及有关教学部门(室、系)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㊵

从《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以来，俄国方面派出来华留学的学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集体。这些人不远万里背井离乡，承受着生活上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他们当中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中国学家和翻译家，为俄罗斯的汉学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实现了沙皇政府要甩开耶稣会士直接开展对华外交的愿望，使对华外交开展得更积极和主动，从而维护了沙俄统治集团的利益。必须指出，在某些历史时期，这种外交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以上情况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

①参见《东方各国的史学》P46，莫斯科大学出版社 1977 年俄文版。

②参见：F·H·Entrecollee. Darts meties et cultures de la Chine. P. 1814－1815

③列·阿·斯拉斯特尼科娃《在第一张俄文报纸上刊登的有关中国的消息》，见《历史问题》杂志 1990 年第 10 期，俄文版。

④谢·列·齐赫文斯基《在俄国与苏联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见《中国与世界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88 年俄文版 P200。

⑤《十八世纪的俄中关系》卷 1，第 19 页，莫斯科，1978 年俄文版。

⑥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 年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第 181 页。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⑦同⑥第 391 页，葛斯顿·加恩《中俄早期关系史》第 69 页。

⑧《燕京开教纪略》卷 3 第 12 页。

⑨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 年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第 340 页。

⑩《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

⑪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 年 P520－523。

⑫参阅：《尼古拉·斯帕法里的一生及著述》，瓦·谢·米亚斯尼科夫 1990 年 俄文版；《基里洛夫写自北京的信件》瓦·谢·米亚斯尼科夫 1991 年 俄文版。俄罗斯第一张报纸《新闻报》于 1728 年 4 月 30 日和 1730 年 3 月 16 日分别详细刊登了经过西伯利亚到中国去的旱路。

⑬资料来源：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 年，尼·伊·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

⑭科·安·斯卡奇科夫《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北京》莫斯科·1958 年俄文版第 16 页，页下注。

⑮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 年，第 291 页。

⑯《俄罗斯国喇嘛学生集》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军机处档，见《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第 2 期，1930 年 6 月。

⑰科·安·斯卡奇科夫《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北京》莫斯科，1958 年俄文版第 11 页。

⑱《古代俄罗斯》杂志，1896 年 2 月份，第 324－325 页，转引自《远东问题》杂志 1988 年第 3 期俄文版。
⑲瓦·谢·米亚斯尼科夫《基里洛夫医生写自北京的信》，见《远东问题》杂志 1988 年第 3 期俄文版。
⑳基里洛夫《写自北京的信》第一封，1830 年 10 月 12 日。俄文版。
㉑同⑳。
㉒㉓何秋涛《朔方备案》卷 13“俄罗斯学考叙”。
㉔科·安·斯卡奇科夫《太平天国起义日子里的北京》1958 年俄文版，莫斯科。
㉕伊·卡尔马诺夫斯卡娅《北京俄罗斯正教会的文化宝藏》见《远东问题》杂志 1990 年 5 期俄文版。
㉖科·安·斯卡奇科夫《太平天国起义时的北京》，莫斯科，1958 年俄文版第 16 页。
㉗尼·伊·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
㉘乾隆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见《清代理藩院资料辑录》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1988 年 10 月版。
㉙何秋涛《朔方备乘》卷 13 “俄罗斯学考叙”。
㉚科·安·斯卡奇科夫《太平天国起义时的北京》莫斯科 1958 年俄文版 第 15 页。
㉛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的呈文节录，见《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
㉜《朔方备乘》，见沈云龙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 273 页。
㉝《修士大司祭帕利卡尔普的信》阿·伊帕托娃，见《远东问题》杂志 1991 年 2 期俄文版。
㉞尼·伊·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P87－88。
㉟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859－1875)圣·彼德堡，1912 年 俄文版。
㊱《俄苏中国学手册》(上)第 34 页、53 页、84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1986 年版。
㊲伊·卡尔玛诺夫斯卡娅《北京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文化财富》，见《远问题》杂志，1990 年第 5 期俄文版。
㊳尼·伊·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 88 页。
㊴《俄苏中国学手册》(上) 第 56 页。
㊵南炳文等《清代文化》第 290－291 页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10 月版。